

Dial

D i a l o g u e

对话

西方文论在中国的命运

代 迅 / 著

比较文学与文化新视野丛书
高旭东 / 主编

中 华 书 局

D i a l o g u e

西方文论在中国的命运

代 迅 著

比较文学与文化新视野丛书
高旭东 主编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文论在中国的命运/代迅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08.8

(比较文学与文化新视野丛书)

ISBN 978 - 7 - 101 - 06190 - 1

I. 西… II. 代… III. 文艺理论 - 对比研究 - 中国、西
方国家 IV. I0 - 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81838 号

-
- | | |
|-------|--|
| 书 名 | 西方文论在中国的命运 |
| 著 者 | 代 迅 |
| 丛 书 名 | 比较文学与文化新视野丛书 |
| 责任编辑 | 张彩梅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08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 $\frac{1}{8}$ 插页 2 字数 200 千字 |
| 印 数 | 1 - 3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 - 7 - 101 - 06190 - 1 |
| 定 价 | 28.00 元 |
-

比较文学与文化新视野丛书

顾问：乐黛云 北京大学教授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
佛克马 欧洲科学院院士
前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主席

主编：高旭东 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
北京市比较文学重点学科带头人

总 序

文学研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与文化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而由于异质于西方文化的东方各国的介入,比较文学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与比较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本来,中国在文学与文化上的对话与比较意识是在与西方文化接触后被逼出来的;而今,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姿态,中国主动认同文化的多元化,并且以多元中的一元寻求与世界各国文化的对话。中西比较文学作为跨文化的文学对话,首先应该寻找二者之间的共同话语,否则,对话就没有契合点,就会各说各的。钱锺书、叶维廉、刘若愚等学者在这方面已取得了一些成绩。不过,随着对话的深入,跨文化的中西文学展现出来的更多的将是差异性,甚至一些基本概念也具有不可翻译性。因此,如何站在当代学术的前沿,对中西文学进行整合,并从中概括出真正意义上的“总体文学”,将是跨文化的中西比较文学的主旋律,也是我们这套丛书的宗旨。

我们这套丛书也有拨乱反正的意图。一般来讲,文明之间的碰撞、冲突与交融,有一个规律性的过程,就是从一厢情愿的生搬硬套到较为客观的对话与比较。譬如,佛教初入中国,一般人就以道家的语汇去生搬硬套,后来才发现佛学与道家的差异。遗憾的是,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已有几个世纪了,我们仿佛还没有

走出文化认同的生搬硬套的“初级阶段”。在历史学与社会学领域,西方社会从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社会演进模式,被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在哲学上,西方的唯物论与唯心论之争,也成了剪贴中国哲学一套现成的方法。而文学上的生搬硬套更是无孔不入:屈原、李白被说成浪漫主义者,《诗经》与杜诗则被说成是现实主义的,在对 中国叙事文学的阐释中,西方的典型、类型、悲剧、喜剧等概念简直是铺天盖地,结成一张生搬硬套的大网,使我们的受教育者无法从这张谬误之网中逃遁。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尽管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一些先觉的学者开始批判反省这种生搬硬套的学术模式,但时至今日,这张谬误之网仍在遮蔽着中国古典文学的真面目,使之难以恬然澄明,将特点呈现于受教育者之前。试想,《诗经》是中国抒情诗传统的正宗,是使中国文学在源头上就与西方形成的史诗传统不同的开山之作,而将之说成是现实主义作品,岂非有意遮蔽中国古典文学的特点?因此,以跨文化的文学对话来取代这种生搬硬套模式,已是刻不容缓的事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搬硬套模式的生成与文化选择的取向并无必然的联系。胡适是“全盘西化”论的倡导者,但他却在戴震那里发现了“实验主义”,在王莽那里发现了“社会主义”。郭沫若既尊孔又推崇庄子,但他与胡适一样,在孔子那里发现了康德与歌德之人格,在庄子那里发现了“泛神论”,并以西方社会的历史演进模式来套中国古代社会。而鲁迅与梁漱溟,虽然一个具有浓重的西化倾向,一个以为世界最近之将来必是中国文化之复兴,但是二者的共同之处,则在于对中西文化和文学的差异有清醒的认识。鲁迅西化的文化选择取向并没有使他把西方的话语生搬硬套到中国的文化与文学中来。他从来没有用“封建主义”

等西方词汇来解释中国古代社会,也没有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来解释中国古代文学。他指出中国没有“悲剧”观念,对于林语堂得意洋洋地将 humor 译成“幽默”并在中国文学中寻找“同党”也不以为然。1932年,针对日本人要编《世界幽默全集》,他在《致增田涉》的信中说:“所谓中国的‘幽默’是个难题,因‘幽默’本非中国的东西。也许是书店迷信西洋话能够包罗世界一切,才想出版这种书。”“中国究竟有无‘幽默’作品?似乎没有。”^①就此而言,鲁迅较之生搬硬套的同代人,显然要清醒得多。可以说,生搬硬套体现了文化碰撞之初对异质文化的认同性变异。因为人们对于陌生的对象,往往喜欢从自己已有的经验去想象它;而另一方面,则是媒介者考虑到本土的便于接受而故意“误读”,就像近代那些“豪杰译”,将西方小说翻译成中国式的章回小说一样。而我们的这套丛书,就是想纠正这种生搬硬套的学术研究模式上有所贡献。

在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领域,值得注意的另一种研究倾向是对“中西”概念的颠覆与取消。一些学人认为,“中”与“西”不是对等的,“西”有许多国家,法国与德国、英国不同,与美国更不同,把这么多不同国家的文学放在一起与中国文学比较,有什么科学性?能够把法国一个历史阶段产生的文学研究好就很不错了,现在居然将西方那么多国家的文学与中国文学相比,又有什么科学性?

先看“中西”这个概念有没有使用的有效性。事实上,非但“西”有很多国家,即使“中”也不尽相同——中原文学与楚文学、北方文学与南方文学,但是,无论是中原文学还是楚文学,无论是

① 《鲁迅全集》第13卷第499页,48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南方文学还是北方文学,都祖述尧舜,都深受儒家与道家文化的影响并且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大的方面说是一个大文化统一体之内的文学。西方虽然国家众多,但是这些国家都祖述希腊、罗马的遗产,中古以降都以基督教为国教(尽管又有罗马公教与东方正教的差异,有天主教与新教的差异),在现代都面临着“上帝死了”的文化困境,因而也是一个大的文化统一体。正如韦勒克(R. Wellek)所说的:“西方文学是一个整体。我们不可能怀疑古希腊文学与罗马文学之间的连续性,西方中世纪文学与主要的现代文学之间的连续性。”^①而将中国和西方这两种大文化中的文学进行比较研究,是真正跨文化的文学对话。至于是研究一个国家的一个历史阶段的文学好,还是研究“总体文学”好,这要看各人的本领。研究一个国家一个历史阶段的文学可以研究得很细很深,也可能研究得琐碎平庸;研究“总体文学”可能大而无当,空疏浅薄,也可能成为康德、海德格尔式的学术大师。比较而言,理论大师皆出自后者,细密的专家则多出于前者。尽管如此,我们一向反对“比漂”——即古今中外,天马行空,什么都知道一点,什么都不深入。我们希望的是扩出去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收回来要成为一个研究专家。这也是我们对于这套丛书作者的期待。

这套丛书得到了北京市重点学科基金的资助。我们对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促进学科发展与学术繁荣的用心,对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对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关怀,对国际知名学者佛克马教授对中国比较文学事业的关心,表示深深感谢。特别需要一提的是,王宁教授虽然已是清华大学外语系的学术带头

①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第44页,三联书店1984年。

人,但他作为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的名誉所长和博士生导师,对这一重点学科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华书局的张彩梅女士对于学术的热忱和认真负责的精神,令我们深深感动,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高旭东

2006年1月16日于北京天问斋

序

代迅教授的《西方文论在中国的命运》，是一部有特色的理论著作，它从比较文论的角度，梳理了西方文论传入中国后中国化的过程，并且探讨了中国现代文论建设的方向。中西文论的冲突、融合是百年来中国文论发展的基本线索，探究这个线索，对于中国文论的现代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代迅教授对这个问题的深度研究，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缺少现代性的思想资源，中国文论不能自行现代化，因此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是引进西方文论包括苏联文论的结果，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历史事实。由于中国传统文论与西方文论的巨大的时空差异，二者之间必然发生冲突，冲突的结果是西方文论和苏联文论的长期主导，而中国传统文论则失去了话语权。“五四”文学革命建立了西方文论的主导权，而“五四”以后则确立了苏联文论的主导权，新时期又恢复了西方文论的主导权。在后新时期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文学理论界对西化和苏化的历史进行了反思，开始注重文学理论的本土思想资源，从而开始了建立中国自己的现代文论的进程。

在当前，完全不顾中国文论传统，全盘西化的主张几乎听不到了，但是，另一种倾向则值得注意。一部分学者受到后殖民主义、新

东方主义的影响,在对中国文论现代化的历史进行反思时,否定“五四”文学革命和新时期启蒙文学思想的现代性意义,认为是一个“他者化”的过程。他们主张抛开西方文论的框架,在中国传统文论的基础上,建设中国的现代文论体系,包括恢复中国传统文论的基本范畴、基本理念、基本方法。当然,他们也主张吸收西方文论的某些因素,但必须纳入中国传统文论之中。概括地说,这是以民族主义为导向的“中体西用”论。

我和代迅教授一样,认为这种主张与全盘西化论同样是一种偏颇。一方面,中国传统文论虽然有丰富的思想资源可供利用,但是其体系属于古典时代,其体悟式的方法造成了逻辑性的薄弱,意会式的概念造成了内涵的模糊,实用理性的观念造成了与现代意识的隔膜,因此不能在这个基础上建设现代文论体系。必须在现代性的前提下,依据现代西方文论的概念、范畴、逻辑、理念,同时吸收中国古典文论的思想资源,加以整合,建设现代中国文论的体系。概括地说,这是以现代性为导向的“西体中用”论。另一方面,对“五四”以来的历史,也不能一概而论地归结为全盘西化或苏化,因为中国传统文论并没有消亡,在引进西方文论和苏联文论的过程中,它已经进行了抵抗、选择、渗透、改造,在不同程度上使西方文论和苏联文论中国化了,从而形成了中国文论的“近传统”。例如,王国维先生、宗白华先生、李泽厚先生等融合中西美学,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对中国现代美学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成果是中国文论现代建设的宝贵资源。因此,这个“近传统”同样需要继承和发扬,使之成为中国现代文论建设的基础。不能不顾这个传统和基础,而跨越时空,回到古典文论的基础上。

那么,面对中西文论的冲突,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和态度呢?我赞成代迅的主张,那就是采取对话、融合、创造的立场和态度,以建设中国现代文论体系。“五四”文学革命主张的世界主义(西化),当代的新东方主义主张民族主义(中国化),都有某种合理性,也都有某种片面性。正是“五四”时期的“西化”(世界化),中国文论才认识了世界、走向了世界,也才认识了自我,具有了自我意识。同时也必须承认,它对中国传统文论的全盘否定,也导致对中国传统文论资源以及中国文论特性的忽视。新东方主义设立了反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从而恢复了中国文论的主体性,并且提醒我们在全球化中注意保持中国文论的特性。但是,它又是以反现代性、反西方文论的立场来确立中国文论的主体性的,因此也导致中国文论现代化的夭折。

我以为,合理的立场和态度是开展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的对话,中国文论包括“远传统”文论,也包括“近传统”文论,都应该成为对话的主体,都应该得到合理的继承。这种中西文论的对话,既是一种不同文化体系的交流(空间性),也是古典向现代的转化(时间性),其中时间性是主导的,因此应该以现代性为导向,在两种理论体系的交流中,完成中国文论的现代化。这里的关键是找到对话的关节点,也就是中西文论在核心理念上的联系,寻找二者的差异和互补。这就需要对中国文论和西方文论的深刻理解,从而给我们的研究留下了广阔的空间。我近年来进行了主体间性理论的研究,提出了中国文论(美学)的古典主体间性的论题,并且主张在主体间性基础上进行中西文论(美学)的对话,以完成中国文论(美学)由古典主体间性向现代主体间性的转化,建设现代中国文论(美学)体系。这种努力

可以看做融通中西文论的一种尝试。

代迅教授是我的老相识,也是忘年交。还在他读研究生的时候,就曾经造访过我,探讨文学理论的问题。他的聪颖好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后我一直关注他的成长,欣喜地看到他脱颖而出,成为优秀的青年学者。这部专著展示了他的学术功力,标志着他跨上了新的学术台阶。老之将至,夫复何求?新人辈出,不胜欣慰。是为序。

杨春时

2007年11月7日

前 言

近百年来,中国文论界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是思想资源的变化。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文论伴随西方的坚船利炮汹涌而至,成为中国现代文论的主要思想资源,并对于中国现代文论体系的建立起到了关键性的启迪和示范作用。随着全球化与信息时代的到来,中外文论交流日趋广泛与便利,西方文论对于中国文论的影响更加强劲。与此同时,呼吁中国民族文论传统断裂的声音也逐渐高涨,在全球化与本土化、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冲突此起彼伏的激流与漩涡之中,西方文论在中国本土化的历史进程,特别是它与中国民族文论传统的关系,已经引起广泛关注。西方文论在中国的历史命运,也就是中国化问题研究,对于冲破中西文论之间互不相容的二元对立僵硬思维模式,推动中西文论的融通,对于新世纪中国文论的未来发展走向,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这是中国文论的现实发展对我们提出的重大理论课题,需要我们对此作出积极的回应。

一、两种西方文论研究

自古以来,中国人的思想资源,其主干是儒、释、道三家,除了释(佛教)是外来的以外,儒家和道家都是中国本土的,并且牢牢占据着

主导地位,儒家学说始终是我们至高无上的经典。但是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引发了中国深重的民族危机和剧烈的政治经济震荡,在百日维新试图以传统方式走温和的、渐进改良的道路失败之后,人们开始了选择与传统加以决裂的激进革命道路。这样,在中国现代化变迁中的文化层面转换,就演变成了在思想资源上对中国本土传统的激烈否定和对近现代西方传统的全面认同。

因而近百年中国知识界的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变化是,人们迅速脱离了传统的汉语思想资源,而更多地依赖近现代西方思想,后者已成为中国社会主导性的思想资源。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这种运作方式直接地制约和影响中国文论,换言之,西方文论已经取代传统的汉语文论资源而成为中国文论的主要思想库。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与文化格局发生新的重大变化。“冷战”格局结束,全球化浪潮蓬勃展开,信息技术高度发展,全球文化的互动性大大增强。文化领域的全球化与本土化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重大理论课题,跨文化的比较文论研究日益引起学界重视。与此相关的是,知识领域的权利控制成为学界热烈谈论的理论话题,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猛烈抨击西方经验对东方的歪曲与控制,在国内学界,同样掀起汹涌的浪潮,谈论近百年中国文论“失语”者有之,主张“重估现代性”者亦有之。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对西方文论输入中国的意义及其对中国文论的影响作出正确的回答。

这实际上是对中西文论作跨文化、跨学科的综合研究,直接关系到未来中国文论发展的新的生长点。在中国文论日益走向国际化的学术语境中,对这个课题的正确解答,将有助于在新世纪进一步融汇中西及中外文论,促进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和未来中国文论

的健康发展。

对西方文论的研究,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西方文论本身的研究,即对西方文论的源头、发展、主要流派及代表人物的研究;另一方面则是对西方文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的研究,即西方文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线索,它是如何启动我国文论的现代转型的,我们是如何根据自身的文论传统,有选择地吸收和改造了西方文论,使之成为我国现代文论传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对西方文论输入中国的成败利弊作出客观和科学的评说。从目前来看,研究后一方面的要求已日益迫切。

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在这两个方面的研究状况是极不平衡的,就前一方面的研究,尽管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经过几代人近百年的努力,已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但是,从后一方面来看,对西方文论在中国传播及其对中国文论所产生的影响,作系统和深入的专题研究、探究其学术规范与传播机制者尚不多见,需要我们对这个薄弱学术环节加以认真填补。这既和这一研究本身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滞后性特点有关,同时又和我们主观上的忽略不无关系。

二、西方文论的三次大规模输入

据阿英编《清代文学丛抄(域外文学卷)》(中华书局1972年版)介绍,中国译介西洋小说,最早是乾隆年间的1740年左右,黄霖著《中国文学批评史》(近代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再次肯定了这个观点。“当时的译作……改头换面,重新写作……实算不得翻

译,并且为数也极少,影响也不大。”^①西方文学大量涌入中国是在近代,具体地说,是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施蛰存先生谈到这样一个情况:

……翻译小说的出版数字,可能两倍于创作小说。

这一现象,是非常突出的。我们当时没有注意到,也从来没有敢于设想。……

……从1890年到1919年这三十年间,是迄今为止,介绍外国文学最旺盛的时期。我们把这一现象,突出地标举为近代文学在接受外国文学方面的第一项特征。^②

当时的小说概念包含了戏剧,实际上当时以小说戏剧为主流的西方文学的大规模涌入中国,西方文学的观念、手法、眼光乃至整个文艺思潮及理论流派也纷至沓来。1905年《新民丛报》第三年第二十二号起,连载了法国学者维朗撰写、蒋智由翻译的《维朗氏诗学论》。孙毓修于1913年《小说月报》第四卷第一号至1914年第五卷第十二号上,陆续连载其《欧美小说丛谈》,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评价西方小说(含戏剧)的专著。黄远生在1914年《小说月报》第一、二号上的《新剧杂论》试图系统地把西方戏剧理论介绍给国人,具有筚路蓝缕的开创意义。对西方文艺思潮及理论流派的译介,可谓风起云涌,为中国人打开了一片崭新的理论天地。大致说来,本世纪曾

① 黄霖《中国文学批评史》(近代卷),第62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②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1)》,“导言”,第17—18页,上海书店1990年版。